

“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挑战与对策

傅才武 黄婷婷

摘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目标与任务。“十五五”时期,在国际秩序深刻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推进、人口结构持续调整的宏观背景下,文化产业日益成为应对国际文化软实力竞争、推动经济动能转换、提升国家影响力的战略性要素,发展文化产业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十五五”,新的国际与国内环境变化,数字信息技术在文化产业的加速应用,深刻影响到“十五五”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这一过程既建构了“十五五”文化产业新的发展趋势,也带动了文化产业领域的结构性矛盾的变化,形成了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挑战。为实现“十五五”文化产业发展目标,既需要进一步深入阐释国家“十五五”顶层设计的逻辑内核,梳理发展进程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回应挑战;又需要明确基本政策思路,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数字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两种推动力量,为“十五五”时期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路径支持。

关键词:“十五五”规划;文化产业;文化政策;文化体制改革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6.02.007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培育优秀文化企业和品牌,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①的五年目标。规划紧扣“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②的核心任务,将文化产业力量转化为文化强国的重要支撑,为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这一战略框架既体现了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文化产业理论创新的前沿,又给出了新形势下文化产业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展现了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固本开新”的鲜明特征。“十五五”时期,面对国际环境深刻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推进、人口结构持续调整的新环境和新的挑战,需要进一步深入阐明国家“十五五”顶层设计的基本逻辑,明确基本政策思路,为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支持。

一、“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趋势:发展方式、动力和模式的转型重塑

“十五五”时期的文化产业发展,不是对既有发展路径的简单延续,而是在全球竞争格局重塑、国内消费需求升级以及科技革命深度渗透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正经历的一场深刻的结构性与系统性变革,呈现出文化产业行业演进的基本趋势与转型特征。

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下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研究”(2024MZD023)。

作者简介:傅才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武汉 430072; fucaiwu2004@126.com);黄婷婷,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 430072; tessyhuang@vip.sina.com)。

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27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第26页。

(一)从“规模扩张为主”到“质量效益优先”:文化产业整体发展逻辑的根本转向

这一转向不仅是文化产业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文化治理从“数量导向”迈向“质量导向”的集中体现,标志着产业发展逻辑已全面告别“有没有”的粗放阶段,进入“好不好”的品质时代,是中国社会进入新时代后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映射在文化产业上的要求。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文化产业尤其是文旅领域普遍采取了“密集铺点、快速扩张”的发展模式。这种“跑马圈地”式的扩张,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尚可依赖流量红利维持运转,但在当前消费升级、投资转型的背景下,已日益显示出其不可持续性。

“十五五”时期,在经济增长基本面日趋稳定、文旅消费“旺丁不旺财”和社会投资收窄的大背景下,文化产业将确立“质量效益优先”的原则,彻底摆脱粗放型数量增长模式,即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将从“铺摊子”转向“提品质”,地方政府将高度注重策划和实施区域性重大项目,以形成示范带动作用。“十四五”后期,文化产业发展的“质量转向”已经显露端倪。“十五五”时期,基于文化产业环境的变迁和文化市场体系对“同质化竞争”的有效约束与对“特色化创新”的激励,文化产业也将从“规模竞争”转向“效益竞争”,更加聚焦核心业务的精细化运营,通过优化成本结构、提升服务体验、深入挖掘文化IP的长尾价值,走向“小而美”“专而精”“大而优”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二)从“资源驱动”到“科技赋能”:产业增长动力的代际转型

科技革命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建构了“十五五”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动力,标志着文化产业的增长模式从“依赖文化资源禀赋”向“依靠技术创新突破”的代际转换。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4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59082亿元,比2023年增长9.8%,高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8个百分点。文化新业态行业对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65.7%,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文化新业态从2019年占比22.94%增长到2024年占比41.75%^①。预测“十五五”期间,文化新业态占比有望在2027年至2028年间突破50%,在2030年占比60%左右。

当前,人工智能已从文本生成、视频生成等表层应用,深入渗透到文化生产、传播、消费的全链条。“互联网(AI)+文化”正不断深化,技术已不再仅是辅助工具,而是重构文化生态的核心要素。AI技术和数字平台的有机结合,推动“UGC+AI辅助”模式快速普及,降低了普通用户的创作门槛,展现出对传统内容生产链条的重构潜力。在一个人人都可以成为AI编剧、导演和影视师的时代,传统影视产业已受到AI影视的严重冲击,剧本、导演、演员、剪辑、配音、特效、灯光、群众演员等专业分工被颠覆,一个人创作一部AI短剧或者AI大电影的时代即将来临,“AI影视师”的工作即将走到前台。进入“十五五”,宣传、传播、广告、玩具、影视、营销等领域将因为AI的植入而出现产业生态重构。

第一,AI赋能传统文化产业、促进智能化改造与转型将成为普遍现象。新闻媒体、音乐、游戏、文学等文化产品与数字平台加速融合,促进了传统文化产业门类的加速转型。如戏曲艺术借助动作捕捉技术实现“云端巡演”,有效突破了传统戏曲传播范围的局限性;工艺美术领域通过3D打印技术提升生产效率与设计精度(如景德镇陶瓷工艺的3D建模与规模化生产),实现了传统技艺与现代需求的有机结合;出版行业则利用大数据分析实现读者需求的精准匹配(如网络文学平台的个性化推荐系统),显著提升了内容传播效率。通过人机协同,传统业态将获得新的发展动能。

第二,“人工智能+文化产业”将呈现出壮阔的产业发展图景。AI、XR、5G、大数据等数字信息前沿技术与文化产业融合形成的创新矩阵,将会给文化产业带来丰富多彩的新业态、新场景和新消费。“十四五”时期,沉浸式体验、AI生成内容、数字人经济、智能演艺、AI陪伴服务等文化新业态不断涌

^① 《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6.0%》,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1/t20250127_1958489.html, 访问日期:2026年2月3日。

现。2025年与2026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机器人的表演,激发了机器人与文化产业融合的热情,机器人与文化产业融合的应用场景层出不穷。全球范围内相继出现了以数字人和智能体技术为依托的AI情感陪伴智能聊天机器人,其已经进入产业化的准备阶段。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印发的《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2023—2035年)》提出,要重点发展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未来显示等九大未来产业。这些未来产业将大大拓宽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新领域,拓展文化产业的范围。

第三,文化产业能够为技术创新提供应用场景,“文化+科技”将形成巨大的生产力。《自然指数》显示:在应用科学领域,中国贡献了全球56%的顶尖成果,相关领域排名前十的机构全部来自中国。对此,《自然》杂志评论道:这不仅是数量的领先,更折射出东西方迥异的科研战略:一方瞄准产业与工程,一方侧重基础与自由探索。《自然》杂志认为,中国与西方分别走向“工程型社会”与“科学型社会”的路径日渐分明^①。“十五五”时期,如何通过文化创新特别是文化产业的创新激励机制,推进中国文化领域和文化科技领域的原创性突破,是推进文化产业可持续性发展和增强经济韧性的有效路径。

(三)从“产业链式衍生”到“产业生态圈共生”:文化产业边界形态的全面重构

有学者提出,从“十四五”到“十五五”,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正在从企业集聚转向“产业链群”。不同于传统文化产业园区的企业集聚、项目集聚、“要素+业态”集聚的特征,随着网络平台的崛起,文化企业集聚正从物理空间集聚向数字空间集聚拓展,其核心资源、组织方式、成本构成等均发生了深刻变化^②。这一转向标志着文化产业正在突破行业界限,呈现出协同增效的基本趋势。

2025年年初,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等12部门联合印发《四川省文化和旅游产业链专项工作方案》,同年3月出台全省文化和旅游产业链10个细分领域三年行动方案,聚焦十大细分领域,围绕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跨界资源整合。2025年5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产业集群发展规划(2025—2030年)》,着眼于促进产业上下游链接和资源整合,促进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这种转变预示着产业发展模式正经历从“产业链独立”向“产业链跨界融合”的生态圈升级。“十四五”时期,“文旅+百业”与“百业+文旅”的融合更多停留在产业链叠加的“链式整合”阶段,而在“十五五”时期,随着AI技术对各行各业的全面渗透,数字平台企业的“产业链生态圈”效应将会集中爆发,文旅产业将迈向“跨要素、跨平台、跨领域”的生态圈发展阶段。文化不再仅仅是其他产业的附加属性,而是与旅游、农业、制造业、教育等领域实现“基因级融合”,构建起相互渗透、彼此赋能的产业生态系统。

其原因是,“十四五”以前,产业链作为不同行业 and 不同企业之间竞争的主要形态,主要基于类型技术建立产品形态。所谓类型技术,是相对于数字平台技术而言的传统技术类型,是指某一类性质相同、功能互补的专业技术集合(如广播技术、出版技术、电视技术等),它能够为某一类生产和消费过程提供专业技术模式,但缺乏像数字技术那样的跨行业和跨领域的技术整合能力。类型技术支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产品生产过程或产业链,如演艺、出版、广播影视等产业链,这些产业链具有由技术范式所决定的明晰的外部边界,因而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轨道性”特性,由类型技术所定义的产品形态就建构起一个具有进入性壁垒(技术壁垒)的产业链。

“十四五”以来,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企业的兴起,带动文化和服务性等业态集聚,平台、网红、货源和消费等要素实现了跨空间的集中,形成了以网络平台为依托的产业集群现象。如在文化和旅游领域,“平台+网红”的产业模式带动了非遗旅游产业、创意产业、设计产业和休闲产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产品的迭代升级。这一趋势说明,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对社会经济领

① 王英俊:《〈自然〉:中国领跑应用科学,贡献全球56%,包揽前30顶尖机构》, <https://mp.weixin.qq.com/s/KckE-sDh2E935c9W9ETB9g>, 访问日期:2025年12月14日。

② 祁述裕:《从产业集聚到产业链群——“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展望》, <https://mp.weixin.qq.com/s/inGUjxNBp5HizE4z2S4z1Q>, 访问日期:2025年12月14日。

域的全面渗透,改变了产业链赖以存在的技术合法性基础。数字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平台技术,正在快速改变文化产业的发展轨迹。“它基于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通用技术集合,能够提供基础性、通用性和开放性的技术方案,也能够为不同行业提供多业态和跨行业的综合性管理系统。”^①平台技术具有能够让所有类型技术所支撑的产业链在平台技术的底盘上实现弯曲对接和跨行业融合的特殊能力,这在文化产业领域体现为以超级数字平台企业为中心的产业生态圈。

通过统计百度、阿里、腾讯、字节等头部互联网企业旗下11类文化媒体平台数据发现,截至2022年年底,相关企业数量超过2000家,App数量784个。其中,上市企业42家,市值规模超过4万亿元^②。在数字技术环境下,以产业链为基础的产业结构被打破,文化产业结构正在重组。“十五五”时期,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对传统技术(类型技术)的升维,新闻媒体、音乐、游戏、文学等文化产品与数字平台加速融合,大量的文化消费者向信息富集的数字信息平台集中,文化产业的生态圈集中趋势将会持续强化。

(四)从“政府主导、市场协同”到“市场主导、政府保障”:资源配置机制的优化调整

充分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两种作用,一直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核心内涵。但如何在文化治理中厘清“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边界,优化文化资源配置机制,则是“十五五”时期推动文化产业关键性制度创新的核心内容。在财政收窄和社会投资收紧的大背景下,“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资源配置机制的重大变革,即是全面从传统的“政府主导”模式转向“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新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随着文化市场体系的日益完善不断得到强化,政府职能则更加聚焦于“治理者”的角色定位^③。

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第一,文化项目投资机制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政府减少对具体项目的直接干预,转而通过优化营商环境、设立产业基金和税收优惠等市场化手段,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文化领域,逐步扩大企业的自主经营权。第二,文化产品供给模式从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企业更加关注消费需求的变化,特别是Z世代对“国潮”“小众文化”“沉浸式体验”的偏好,推动文化产品向个性化、多元化方向发展。第三,文化产业监管模式从“以事前审批为主”转向“以事中事后监管”为主,政府职能更加聚焦于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环境、保护文化遗产和保障文化安全,文化治理领域“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深化。在这一政策的激励下,差异化策略将成为“十五五”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优势,文化企业将通过“在地性挖掘”和“细分市场深耕”两大路径,建立差异化发展路径。

(五)从“国内循环”到“国内国际双循环”:产业发展空间的全球拓展

进入“十五五”时期,深化实施“国内国际双循环”是我国文化产业在逆全球化背景下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抉择,标志着产业发展的空间格局从“以内为主”向“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性调整。本质上,这一转型是“内需驱动”与“外需拓展”的协同推进,旨在实现文化产业发展中“有效利用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的战略目标,探索构建“以内促外、以外补内”的双循环市场格局。

首先,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企业和文化IP,形成“以内促外”的产业发展路径。充分发挥14亿人口规模的国内市场优势,为文化企业提供了“试错”“迭代”的“第一市场空间”,例如泡泡玛特等中国新生代潮流品牌通过本土IP故事和独特审美建构,重塑“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使“国潮”品牌在通过国内市场验证后,逐步向东南亚、欧美市场输出;网络文学IP则通过国内市场反馈优化后,改编为影视剧或游戏实现海外输出,“网文”“网剧”“网游”已成为我国文化出海的“新三强”。其次,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通过国际文化市场吸纳全球优质资源,形成“以外补

① 傅才武、赵辉:《文化技术阶梯理论:技术范式转变中的文化体制改革进阶路》,《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9期。

② 傅才武、赵辉:《文化技术阶梯理论:技术范式转变中的文化体制改革进阶路》,《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9期。

③ 宗祖盼、刘欣雨:《试论全国统一大市场对文化产业的影响》,《文化软实力研究》2022年第5期。

内”文化产业发展路径。如通过引进海外优秀电影产品等,不断提升我国的电影产业发展水平;通过引进海外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如影视后期制作技术、文化IP运营模式等),提升我国电影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互动中,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的全球话语权与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五大发展趋势并非彼此割裂,而是相互关联、交互作用和协同共进。“质量效益”的提升,高度依赖于“科技赋能”而形成的技术生产力;“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深度推进,依赖于“市场主导”机制,即“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力和综合性推动力;而文化产业推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目标的实现程度,则迫切需要发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潜力,依赖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这些发展变化趋势共同构成“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多维度复杂图景,既为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也显著提升了产业生态的复杂程度,要求市场主体与政策制定者建立和运用整体性、前瞻性的系统思维,形成科学的因应策略。

二、“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中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与深层制约

尽管“十五五”时期文化发展的总体愿景乐观,战略方向与演进路径也已基本明晰,然而,源于文化体制机制中长期积累的障碍因素,来自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治理挑战以及国际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使得当前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仍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与挑战,它们构成了实现“十五五”战略目标的现实障碍。

(一)供需之间的结构性“裂隙”:文化消费繁荣表象下“质”与“量”的失衡

“十四五”期间,包括旅游消费在内的文化消费在居民消费支出占比中实现了快速增长,出现了文化消费的繁荣期。进入“十五五”,文化产业领域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在于消费预期减弱与供给结构失衡。从需求端来看,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居民文化消费信心与能力走弱,呈现出整体消费“降级”与粉丝“分层”渗透并存的特征:一方面,大量消费者对大型演唱会、大型山水文娱项目等传统文化项目的消费趋于收紧,更多消费者转向短视频、免费阅读、网络游戏等低成本线上消费;另一方面,数字平台的加入让“粉丝经济”和“谷子经济”崛起,文化消费市场“分层分化”加剧——高收入群体追求高品质、定制化,如高端艺术品、专属文旅体验的服务。而中低收入群体更青睐普惠性、平价型文化服务。粉丝群体的专业分层,促使居民文化需求结构日趋复杂化,但总体上受经济环境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下降的影响,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受到抑制。

从供给端来看,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存在“低水平过剩”与“高质量短缺”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低层次、同质化产品和服务仍在泛在化供给,如不少地区盲目跟风建设“网红打卡点”“仿古街区”,其内容匮乏、形式单一;另一方面,真正贴合特定群体需要的高质量供给依然稀缺——面向Z世代的个性化、沉浸式文化产品供给有限,适应老龄化社会的“文化康养”服务与“适老化”数字文化产品存在明显缺口。以网络文化为例,尽管网络文学、短视频等新业态用户规模突破了10亿人,但各类产品“鱼龙混杂”、价值观导向偏差(如低俗猎奇、拜金主义)等问题仍未得到根治。进入“十五五”,优质内容“供给不足”与大量文化产品“产能过剩”并存,反映出文化供给“量”的繁荣与“质”的不足之间的结构失衡,形成了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深层制约。

(二)区域发展不平衡:东西部文化产业极化趋势被路径锁定并将不断强化

“十四五”以来,京津冀文化产业群、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群、长三角文化产业群已基本形成,正在形成中国和全球文化产业的核心区。例如,珠三角文化制造业集群加快形成,广州已建成创意设计服务、文化装备及消费终端生产、动漫游戏3个千亿级文化产业集群,跨区域产业链分工体系逐步建立。东部发达地区本身具有数字经济优势,“十五五”时期东部发达地区将会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加快形成数字文化产业集群,建立起领先于中西部的数字文化产业圈。

“十四五”以来,中西部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逐步形成比较优势,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和东北地区的民族文化产业、生态康养、冰雪休闲等逐渐形成特色文旅产业,行业发展较快。“十四五”以来,东北地区冰雪特色文化带、西南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带、西北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等所涉省区,相继发布区域合作倡议、指南或框架协议。文化和旅游部联合相关部门发布《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规划》《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规划》等文件,特色文化产业带初具雏形。但是,中西部地区(除长沙、成都外)文化产业发展的规模有限,文化产业集聚化、集约化程度仍然有待增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规模超19万亿元,比2023年增长7.1%,再创历史新高,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但西部地区仍然落后于东部地区,分区域看,东部、中部地区文化产业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41750亿元和28726亿元,比2023年分别增长7.8%和7.3%,增速快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东北地区文化产业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8462亿元和2485亿元,分别只增长了2.6%和1.8%^①。东西部之间的文化产业发展差距持续扩大。

在中西部地区,相比于数字经济和高科技产业的市场复杂性,文旅产业所独有的自然资源与文化遗产的行政垄断性,能够较容易地成为政府发展经济和旅游产业的重要抓手,政府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但“政府干预过多、市场作用不足”的局面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就可能进一步加剧市场扭曲现象。“十五五”时期,中西部地区尤其要高度重视并发挥文化市场在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中的独特价值^②,进一步认识并发挥企业家精神的作用。

(三)科技支撑短板:核心技术“卡脖子”与“治理滞后”的双重制约

当前文化领域的科技支撑能力仍存在明显短板,且与文化治理滞后形成“双重制约”。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性仍是当前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文化领域的专利授予中,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占比超过70%,而涉及人工智能算法、数字渲染、沉浸式体验等的核心技术型专利占比不足30%,文化领域所依赖的高端渲染引擎、人工智能算法等关键核心技术仍严重依赖海外技术供给,文化领域所用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影视后期制作软件、虚拟现实(VR)仿真系统等,大部分仍然依赖进口(如Autodesk、Adobe系列软件),我国文化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缺乏“技术话语权”和数据主导权。这种“卡脖子”的技术风险将对文化产业高端化进程构成严重的阻碍。在数据资源层面,公共文化资源数据开放不足成为“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这本质上是文化治理中“数据治理机制”的缺失,数据开放程度低、标准不统一的直接结果。

与此同时,网络技术全面渗入文化和旅游产业链,造成了对传统业态的“结构统制”,文化行业日益严重的“高维技术掠夺”现象,也对创新政府文化管理和行业自律规则提出了新要求。近年来,数字网络平台整合原来分散的文化企业和产业链,成为文化市场的主导性力量,导致行业利润大量向平台集中。例如,旅游平台携程集团2024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72.95%,而与之相关的宾馆酒店行业利润率不足5%。这即是数字技术环境下的“结构统制”现象:“当运营成本与佣金率较小时,‘直销+OTA分销’双渠道策略占优;当运营成本较小且佣金率较大时,直销单渠道策略占优。当运营成本较大时,无论佣金率大小,OTA单渠道策略占优。”^③数字平台与宾馆酒店利润出现如此巨大的剪刀差,源于宾馆、酒店不得不依赖平台的技术网络结构(单个酒店建立直销渠道的运营成本过高)。酒店对OTA过高的依赖性使OTA利用其强大的市场影响力不断提高佣金率^④。这一行为损害了平台企业和实体企业共同发展的行业生态。

① 《2024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 https://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506/t20250627_1960269.html, 访问日期:2025年12月14日。

② 傅才武:《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市场的独特价值》,《文化软实力研究》2019年第5期。

③ 张巧可、陈洪转、万良琪:《酒店直销与在线旅行社分销渠道策略优化分析》,《中国管理科学》2023年第2期。

④ 叶飞、陆木蕊、廖鹏:《“酒店+OTA”双渠道供应链超订策略研究》,《运筹与管理》2015年第2期。

(四)面临国际传播乏力、复合型人才短缺与伦理价值扭曲等多重挑战

国际传播能力不足、复合型人才短缺与伦理价值扭曲或文化价值认知偏差等问题,共同构成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3个重大挑战。

1. 国际传播能力不足:从“产品输出”到“价值传播”的进阶困境。第一,传播层次浅。我国文化“走出去”仍停留在“浅层次的产品输出”层面,缺乏“深层次的价值传播”的系统性建构能力。尽管《黑神话·悟空》《PUBG MOBILE》《原神》《Age of Origins》等游戏出海成果丰硕,《三体》《流浪地球》《哪吒2》等国产影视剧海外发行取得一定成效,但海外市场仍然有限,《哪吒2》创纪录的159亿元总票房中,海外市场票房收入只占1.3%左右。“文化出海”还普遍面临中西文化背景差异导致的文化“折扣”难题,如《木兰辞》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的乐府诗,花木兰“代父从军”“忠孝两全”的形象备受国人喜爱。而迪士尼凭借其全球传播霸权,定义了英雄人物花木兰“追求真我”“追求个人价值”的形象和核心价值观,电影中的服装、化妆、道具虽有中国元素,但主要服从于西方的价值观。“中国话语”与“世界表达”的转换机制本就是难题,加上中西文化沟通机制不健全,基于文化产品的文化价值难以实现有效传递。

第二,国际话语权不足。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①我国虽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目前享有的国际话语权却与综合实力不符,导致文化资源被挪用,解释主权遭侵蚀。中国话语和中国方案“说不透、传不开”的局面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进入“十五五”,中国文化“走出去”一方面势必遭遇更加严重的“西方围堵”,另一方面也面临数字技术平权的历史性机会,“当前国际舆论话语权竞争呈现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由多个后发国家推动的参与主体扩大化;二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媒介技术运用。这一新格局为后发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也为其增强话语权提供了可能路径”^②。东西方国家话语权的竞争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会持续存在,但在数字技术全球化普及的同时也赋予了后发国家弯道超车的历史机会。

第三,文化原创力被算法削弱。2024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围绕提高文化原创能力,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孕育催生一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构筑中华文化的新高峰。”^③这一重要论述明确了文化原创力在新时代文化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深刻揭示了文化原创力对驱动数字文化产业升级、构筑新质文化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意义。然而,“算法”在数字平台的泛在化使用,使得数据和算法对信息的统治能力越来越强,对原创优质内容的聚合一直处于一种掠夺式状态,这不仅阻碍了高水平内容的输出与流动,而且不利于优质原创内容的产出^④。

2. 复合型人才短缺: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人才瓶颈”。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需要“文化+科技+市场”的复合型人才,但当前人才供给存在明显缺口,原因是文化治理中“人才培养机制”的滞后。既懂传统文化又掌握数字技术的“非遗数字化人才”、既熟悉国内市场又了解国际规则的“文化贸易人才”、既具备创意能力又擅长商业运营的“IP管理人才”等严重不足,人才结构的“单一化”限制了产业的创新活力与国际竞争力。例如,在数字文化领域,企业普遍面临“懂技术不懂文化”“懂文化不懂市场”的人才困境,而高校学科设置仍以单一专业为主,“文化+科技”交叉学科(如数字人文、数字遗产等)数量不足,企业与高校缺乏深度合作,导致人才培养与产业实际需求严重脱节。要系统性地破解这一难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6页。

② 余纲正、景嘉伊:《支撑资源、操作能力与数字时代的国际舆论性话语权竞争》,《当代亚太》2025年第5期。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295页。

④ 陈斌、杨爱玲主编:《传媒技术研究》,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2023年,第194页。

题,必须通过国家和地方政府设置“交叉学科建设补贴”、落实“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等治理手段,打通教育与产业之间的壁垒,推动人才供给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适配”。

3. 伦理价值扭曲与文化价值认知偏差: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单一价值倾向”。部分地方与企业仍存在“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的倾向,将文化资源简单视作“快速变现工具”,忽视其传播功能与伦理价值,在实践中忽视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反映出当前文化治理中“文化价值引领机制”的缺位。例如,一些文旅项目为追求流量,不惜炒作低俗话题、曲解历史文化;部分网络平台为提升收益,默许低俗内容传播,导致文化价值传播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失衡,长远来看阻碍了文化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这些挑战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交织、形成“连锁反应”与“负向循环”:国际传播能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可追溯至文化IP内在价值挖掘不足和叙事能力薄弱所导致的内容质量不高;而IP质量偏低,又与复合型人才短缺、科技支撑不足等基础能力缺失密切相关;区域发展失衡既受政府过度干预的体制性影响,也因人才、技术等高端要素“向发达地区单向流动的虹吸效应”而加剧,进一步拉大了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因此,破解这些错综复杂的系统性难题,亟须从深化文化治理体系改革和制度创新、技术赋能、市场培育、人才支撑等多维度协同发力,从根本上打破路径依赖,以系统性改革打通文化发展中的“制度性堵点”与“能力性痛点”。

三、重构发展路径:“十五五”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思路与策略

“十五五”时期,必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规划部署,担负起以文化建设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服务于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使命,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文化产业彻底摆脱“速度型”规模依赖,转向“价值驱动型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一)“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目标定位与价值

“十五五”时期的文化发展并非一个孤立的历史进程,而是深嵌于全球产业格局加速演化、国内经济动能转换与科技革命持续深化的多重时代背景之中。文化产业的当代价值,就寄寓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进程中。进入“十五五”,文化产业将逐渐由国民经济的辅助角色加速向支柱性产业迈进。

“十五五”期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超过5%。祁述裕团队基于2013—2023年文化产业增加值、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历史数据进行测算后得出,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10.52%,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年均增长率为2.21%。按照这一增速,预测“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会在2027年超过5%的关口,到2030年达到5.34%^①。

“十五五”期间,发展文化产业将成为实现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国家统计局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2023年文化高质量发展指数为185.0(以2012年为基期赋值为100);2012—2023年年均增长5.8%,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其中,文化创新创造指数始终保持逐年提高,2023年为200.4;2023年文化生产供给指数为170.7;文化服务参与指数为180.0;文化传播影响指数为188.9。国家统计局的研究显示,文化创新创造对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凸显,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呈现强大活力^②。“十五五”时期,发展文化产业将成为应对不确定性冲击及增强经济韧性的基本措施。当前全球经济正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动荡,阵营分化加剧、地缘博弈升温、技术竞争白热化与债务风险累积等多重挑战交织叠加,同时随着全球经济阵营分化与中美经济博弈的不断加剧,“十五五”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既可能凭借举国体制的结构性优势获得巨大的发展机遇,但也将面临多重不

① 祁述裕、王林生:《“十五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笔谈(一)》, <https://mp.weixin.qq.com/s/8k88HRLcIlXky0aXS0s09Q>, 访问日期:2025年12月14日。

② 《我国文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统计专报》2025年第14期。

确定性冲击,需要显著增强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韧性。顺应中国人口结构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的趋势,推动经济社会从“资源密集、人力密集”的传统产业结构向“高创意、高内涵、高附加值”产业的转型,文化产业能够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作出重要贡献。

(二)“十五五”文化产业发展的策略

1. 科学定位政府发展文化产业职能,厘清政府与企业的边界,既不“缺位”也不“越位”。第一,清晰划定公共文化与文化产业的边界,科学界定政府文化事权与支出责任。坚持将公共支出责任局限于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范围内,不越过公共文化产品与市场产品之间固有的边界。既要坚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底线,着力破解公共文化服务“普惠性不足”的问题;也要积极激发“文化产品供给多样化”的市场与社会活力,切实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个性化”文化诉求。当然,在“十五五”文化产业的“市场”转向过程中,政府的职能并非简单地“退出”或“让位”,而是为市场有效运行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条件。首先,明确和把握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双效统一”原则,树立正确的发展方向,通过奖励机制,鼓励并引导市场产出高质量产品。其次,通过政策导向,优化文化产业的创新生态环境,降低企业运营和创新成本。2025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明确提出要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用地、科技等一揽子经济政策,系统性降低文化企业经营成本,鼓励社会资本投入^①。其中特别提出要重点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加强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搭建文化数据服务平台,建设文化领域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等。第二,快速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企业集团,形成有序竞争结构。当前,我国文化企业虽在国内市场体量庞大,但国际竞争力仍然偏弱。目前跻身全球文化企业前十强的国内企业,其海外营收占比普遍低于5%,远低于迪士尼、华纳兄弟等国际巨头30%以上的占比,显示出我国文化“走出去”仍存在巨大潜力。第三,支持民营文化企业发展壮大,增强文化市场活力。从网络文学、短视频到沉浸式演艺,“十四五”以来,绝大多数新业态、新模式的探索与推广均由民营企业率先推动。应进一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完善“公平竞争审查”“民营企业权益保障”等机制,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项目审批等方面切实给予公平待遇,鼓励民营企业参与重大文化项目投资和公共文化服务运营,充分释放其创新潜能。

2. 完善政策法规的体系化,加快文化产业立法,强化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目前,关于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国家政策与地方法规并不少,但国家层面的“文化产业促进法”仍然没有出台,体系化的政策措施也仍在探索形成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跨部门政策协调机制,统筹文化、科技、产业、财政、税收等多部门政策的制定,加强政策协同,促进政策法规的体系化,着力破解“政策碎片化”问题。加快制定和尽快推出《文化产业促进法》,明确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原则、扶持政策与法律责任,为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法律依据。适时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健全文化IP、数字内容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强数字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立法。探索建立包容性制度,大力激发文化行业领域的企业家精神。在数字化转型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文化企业面临内容创新、技术融合与国际竞争等多重挑战,亟须以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为引领,以创新驱动为核心,提升文化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持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企业管理与文化企业家培养课程体系,大力培养“新质生产力”导向的创新精神,为文化企业家植入创新基因;推进职业经理人市场化改革和包容性制度建设,实现企业家精神与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深度耦合。

3. 进一步发挥中国巨型市场优势,构建“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双循环格局。第一,强化“要素协同”有效激活内需潜力。要依托“文旅+农业”“文旅+工业”“文旅+科技”等跨界融合模式,拓展文化消费,在激发居民文化消费潜力的同时,创造新的就业。通过“文化+”,创造新型职业岗位群,如以情感消费为特点、提供情绪价值的新职业群,以满足老年人文化娱乐、终身学习、社交活动、生命关怀等

^①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501/content_7000958.htm, 访问日期:2025年12月14日。

精神文化需求的新职业群,以及围绕数字化生产方式而产生的新职业群等。第二,借力数字文化产业的延展性,开拓国际市场。立足国际文化市场的调整期,抓住国际规则重构的窗口期,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文化贸易制度建设,推动制定跨境数据分级流动、文化数据主权等关键标准,提升我国在全球文化叙事与规则体系中的主动权。近年来,微短剧(网络影视剧)、网络文学、网络游戏成为文化出海“新三样”,搭建起了文化“走出去”与“引进来”的产业渠道,为创新数字文化贸易规则提供了前期基础。第三,借助海外和民间自媒体的力量,疏通跨文化转译的渠道。根据Nox聚星行业数据库观测,自媒体和第三方非中国官方账号(绝大部分由海外IP注册)在“中国话题”内容总播放量、订阅总量、互动率等核心指标中占据压倒性优势。官方背景账号(如央视、芒果TV等)的“中国类”YouTube内容,总流量占比往往不足20%。80%以上的流量来源于非官方、海外IP账号,如海外自媒体(以李子柒、滇西小哥等为典型代表)和居住在中国或长期观察中国的外籍博主(如foreigners in China频道)^①。要支持国际网红与文化(生活)博主通过短视频分享中国日常生活与传统文化,以平民化、生活化的内容促进国际受众从“平视”视角感知中国;鼓励海外华人社团和文化机构举办“中国文化节”“非遗展演”等民间交流活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增强文化认同。第四,办好国际文化展会,扩大“当代中国IP”的国际传播渠道。应着力打造“当代中国”文化IP,逐步降低对“熊猫”“功夫”等传统符号的过度依赖,深入挖掘戏曲、传统工艺和传统医药等非遗资源,推动传统文化与旅游、教育、时尚等领域的深度融合,推出更多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城市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类的网络影视产品,形成当代中国文化IP,向世界呈现一个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同时,高水平办好中国(深圳)文博会、上海国际电影节等国际性展会,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交流平台,推动形成“走出去”与“引进来”良性互动的开放新格局。

4. 突出数字与科技赋能,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构建产业发展新动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②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③。国务院办公厅2025年1月发布的《关于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进一步明确,将“文化和科技融合企业、园区”作为重点扶持领域^④。

第一,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协同创新效应,加强文化科技重点领域的研发。在基础技术层面,需加强文化领域的基础技术研究与核心技术攻关,设立专项科研基金和国家重点研发项目,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文化企业开展联合攻关,重点突破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底层算法、数字孪生高精度建模技术、沉浸式体验交互技术等“卡脖子”产业应用关键环节。同时,适度超前布局文化“新基建”,重点突破脑机接口、量子信息、元宇宙等前沿技术,为文化产业开辟全新发展空间。其中,脑机接口技术的突破有望实现“意念控制”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而量子计算则可能突破大规模文化数据的存储与分发瓶颈。聚焦国产影视后期制作系统和文化资源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加快推进文化领域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进程,减少对进口软件与设备的依赖,建立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支撑系统。

第二,分层次推动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构建规范有序的数字文化生态。对传统文化产业进行“数智化改造提升”。针对戏曲、文博、出版和演艺等传统业态,通过科技手段改造其生产与传播方式。加快搭建人工智能+文化产业公共平台,开展核心技术储备与应用场景研究,借助AI产业链,延伸和

① 王缉宪:《展现真中国 海外IP和游客最重要》, <https://mp.weixin.qq.com/s/xv9ly9L3sav7YglVqjDG6A>, 访问日期:2025年12月14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34页。

③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0/content_6983529.htm, 访问日期:2026年2月3日。

④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501/content_7000959.htm, 访问日期:2026年2月3日。

拓展文化产业等应用端,致力于形成一批文化产业领域垂类模型,推动示范性应用场景落地,形成“AI企业+文化企业”协同发展的新蓝海。前瞻性布局未来文化产业业态。加快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数字文化产业园、“5G+文化体验基地”等基础设施,积极培育数字创意、元宇宙文旅、虚拟数字人等新兴产业,打造一批“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的标杆项目,形成新的产业增长极。

第三,顺应数字时代的发展,优化数字化管理体系。一方面,探索构建“数据开放制度”与“数据确权机制”,大力推进公共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与开放共享,加快对古籍、非遗、文物、地方戏曲等资源的数字化采集和标准化处理,建设全国统一的文化资源数据库,并制定分级分类开放规则——对非涉密资源向社会免费开放,对核心资源面向科研机构和企业定向开放,从而为数字文化创作提供基础素材支持。另一方面,系统构建数字文化空间的治理规则,针对数字文化领域存在的版权侵权、内容低俗、算法滥用等问题,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政府监管+平台自律+社会监督”的多元协同治理体系;明确AI生成内容的标注体系,落实平台对用户生成内容(UGC)的审核责任;规范算法推荐机制,防范“流量至上”对文化审美和伦理的扭曲;加强未成年人数字权益保护,推动建立适龄提示制度与内容过滤机制,共同营造清朗、健康、有序的数字文化环境。

5. 优化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强化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文化创造核心在人”^①。人才事关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大计,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支撑。进入“十五五”,人才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更加明显,谁拥有了人才,谁就拥有了核心竞争力。“十五五”时期,针对复合型人才短缺的问题,要构建“培养、引进、激励”一体化的人才体系。在交叉学科建设上,立足文化与科技融合的趋势,对接产业需求,鼓励在高校探索设立“文化产业交叉学科”和“数字人文学院”,强化“复合型”与“创新型”人才培养。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深入推进高校与企业的双向联动与产教融合。鼓励高校与文化企业共建紧密型实习基地、联合实验室;支持文化企业资深从业者到高校任实训教师。同时,进一步完善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将市场业绩、创意成果纳入人才评价体系,将在文化创新、国际传播等关键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才纳入国家级人才的奖励渠道,形成“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的人才生态。

四、结论

“十五五”时期,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进程的并行和大国竞争博弈的深化,赋予了文化产业重要的战略性价值,发展文化产业日益成为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成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措施,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渠道。AI和新技术的创新迭代及广泛应用,促使文化产业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出现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型。当前文化产业面临的高质量产品供给不足、区域失衡、伦理风险、算法操控等挑战,对“十五五”国家文化产业的战略创新、法律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提出了新要求,必须进一步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培育优秀文化企业和品牌,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探索创设国家文化创新引导基金。既需要进一步强化政策体系创新,突破人才与伦理瓶颈,优化区域与市场布局,构建“创新驱动、融合赋能、治理协同”的支持体系;又需要通过重建以“三融合”(文化与科技、文化与旅游、文化内循环与国际大循环)为基础的新型推动力,加快5G、AI、区块链等技术应用,推动内容生产、传播、消费全链条数字化转型,以人民为中心,激活大众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旅游”“文化+制造”“文化+乡村振兴”等模式创新,推进文化与产业跨界融合,以形成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推进从“文化产品出海”向“数字生态圈出海”升级,打造国际化文化IP,促进国内与国际市场协同融合,以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① 习近平:《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求是》2025年第8期。

Trends, Challenges, and Policy Respons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during the Fifteenth Five-Year Plan Period

Fu Caiwu^{1,2} Huang Tingting¹

(1.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P.R.China;
2. Nation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P.R.China)

Abstract: The Proposal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Formulating the Fifteenth Five-Year Plan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et forth the goals and tasks of vigorously promoting cultural undertakings,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and en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city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uilding on the foundation established during the Fourteen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has witnessed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the number of cultural market entities and overall industry scale have expanded continuously, while the development paradigm has shifted decisively from quantitative growth to qualitative enhancement.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culture has catalyzed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boundary reconstruction, fostering innovative formats and business models. Furthermore, the industry's developmental space has progressively evolved from being primarily driven by “domestic circulation” to a new and dynamic pattern characterized by the mutual reinforcement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irculation.” These accomplishments have collectively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However, it is essential to soberly recognize that several prominent issues and challenges persist. These include structural imbalances between cultural consumption supply and demand, uneven regional cultural development, dual constraints of technological bottlenecks in core technologies and lagging governance mechanisms, insufficien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bilities, and shortages of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 In the coming phase, whether these challenges can be addressed systematically and effectively will directly impact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s potential and the enhancement of its developmental capacity. Changes in both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nvironments, together with the accelerate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the cultural industry, are profoundly reshaping the development pathways and models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during the Fifteenth Five-Year Plan period. While this transformation creates new development trends, it also intensifies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within the cultural sector, generating internal constraints on industry development.

To achieve the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objectives for the Fifteenth Five-Year Plan period, policymakers must further clarify the core logic underlying the national strategic framework, systematically address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formulate effective responses to emerging challenges. This requires establishing clear policy directions that harness the dual driving forces of effective government and efficient markets, alongside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Such an approach will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olicy pathways necessary for advancing high-quality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during the Fifteenth Five-Year Plan period.

Keywords: “15th Five-Year Plan”; Cultural industry; Cultural policy; Cultural system reform

[责任编辑:郝云飞]